

Creating Confucian Authority: The Field of Ritual Learning in Early China to 9 CE

Robert L. Chard

Leiden: Brill, 2021

217 pages, ISBN 978-900-4461-91-8

本書作者 Robert L. Chard 係牛津大學亞洲與中東研究學系教授，主攻儒家文化史和禮學研究、中國宗教史以及政治軍事史。本書是其第一部專著，主要關注西周到西漢末年儒家發展的文化史，和禮儀學識（ritual learning）對儒家興起的促進作用。相比於傳統思想史的取徑，作者更強調採用文化史視角研究儒家逐步成為主導意識形態和政治力量的歷史進程，重點關注早期儒者們的禮儀實踐，認為儒者熟練掌握並大量運用禮儀是漢初儒家政治和思想地位之所以上升的重要路徑，而飽讀禮學的官員成為兩漢政治中的重要力量，因此禮儀學識成為西漢初年到王莽時期文化發展的主線。

全書依時間順序一共分為五個部分，包括導論和結論。在導論中，作者以西漢初年的儒者叔孫通之事為例，點明全書主旨，亦即禮儀學識如何幫助儒者提高政治地位，並最終確立儒家在意識形態上的統治。作者也討論了“Ritual”與「禮」兩者含義的異同，解釋「禮」在中國語境下的多元含義，指出「禮儀學識」是他為了闡述觀點而創造的概念，意思是早期中國所有關於「禮」的知識，在當時的語言中並沒有相對應的名詞。作者還指出儒家在早期中國不單純是思想現象，還是一種文化現象，因此儒者不應該只被看作思想家，也應該被看作政治家、倡導者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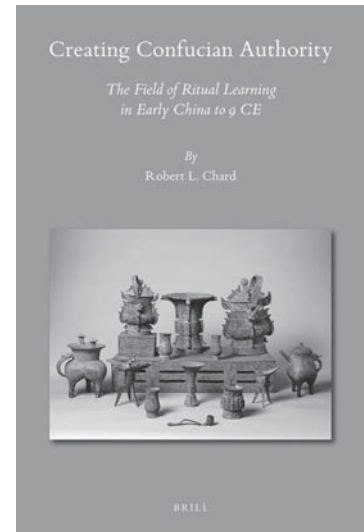
引入主題後，作者從西周開始至王莽的新朝為止，將禮儀學識分成三大階段進行考察，分別是春秋時期、戰國到漢初時期以及漢初以後，後兩個階段以漢武帝為分水嶺，三大階段的論述構成作者接下來三個章節的內容。

基於對《左傳》的解讀，作者認為，

春秋時期是禮儀學識發展的「黃金時期」，禮兼具社會治理和個人修養的層面，儀式、禮儀和社交技能等禮數的可見形式是武裝貴族地位和身分的重要象徵，禮的實踐是貴族們維護等級秩序的手段。基於對《論語》的解讀，作者提出孔子似乎將禮作為其學說核心的觀點，在保持精確實踐禮數的同時，減弱了禮的貴族性質，從而向更下層的社會大眾推廣。

到了戰國時期，一些儒者試圖進入政治權力的領域中，比如孟子和荀子。前者最終失敗，而後者取得一定成果。但這個時期的儒者並沒有把禮儀學識作為吸引執政者和施加影響力的手段，直到叔孫通的出現。繼叔孫通之後，漢初的儒者繼續通過掌握實際儀式而獲得政治權力。對此，作者補充道，戰國時期也可能存在類似叔孫通通過禮儀學識爭取統治者支持的先例，但是囿於文獻限制，缺乏堅實的證據證明。這也可能是先秦時代口傳學術的後果。到了漢代，口耳相傳的學術傳統被取代，轉而記載於文本。

第三個階段是儒者們在政治上走向勝利的重要時期。作者指出，得益於前兩個階段的發展，以《禮經》為核心的儒家經典成為禮學知識的重要部分，而其他先秦文獻如《詩》、《書》也成為禮學知識的權威性證據來源。西漢之初仍保留戰國以降強烈的方術信仰，武帝沒有採用儒家的帝王儀式，而是選擇了古老的祭祀形式，同時儒家經典研究和教育停滯不前，在在顯示西漢早期



禮學家們並沒有指導政治的實際能力，而目前的一般認識高估了這個時期儒家的重要性；但從元帝朝以降，西漢王朝的最後半個世紀，禮學逐漸發展壯大，從禮學文本中構建出一套更新的宇宙論體系，且其擁護者形成穩定的官僚集團。作者認為禮學知識在西漢不斷發展，王莽自身是一個研究《周禮》並以此為據設計制度的儒者，禮學在王莽創立新朝時達到高潮。至於王莽失敗和東漢

以後的禮學重建，則是作者後續作品討論的主題了。

總體而言，本書從新的視角切入，在重構早期儒家發展史方面有一定的成果。文化史作為新的史學範式一般常見於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有別於經典的思想史研究，本書將此一範式應用到早期中國史研究中，也有一定程度上的革新與突破。（吳啟維，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碩士生）

Making It Count: Statistics and Statecraft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runabh Ghos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360 pages, ISBN 978-069-1179-47-6

本書作者郭旭光（Arunabh Ghosh）為哈佛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本書修改自其博士論文，詳細回顧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統計制度的發展歷程。隨著 1949 年的政權成立，革命者面臨雙重挑戰：缺乏基礎統計設施，以及迫切需要擺脫資本主義統計的普遍要求。作者以統計為切入點，利用來自中國、印度和美國的大量資料，圍繞時人對自然數理統計和社會主義統計的不同理解方式為核心，解釋統計學和社會事實是如何被理解和概念化的，並探討政治領導人、統計學家、一般學者，甚至文藝界人士所做的選擇，為中國向社會主義轉型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

本書共有八章，除引言和結論外，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二至四章，探討 1949 年後國家統計的變化。在蘇聯統計專家的協助下，東北率先成立東北人民

政府統計局並試行統計報告雙軌制，

為在全國範圍內建立自上而下集中統一的統計工作提供經驗。與此截然不同的，統計教育政策在此後兩到三年內維持不變，直至 1952 年後，統計學家們才開始通過改變學術課程和批判資本主義統計，重新定義統計學。換言之，實踐的變化先於教育和學術話語的變化，共產黨統治帶來的政策斷裂與連續性的要素比例取決於時間範圍及地理焦點。

第二部分包括第五、六章，通過對各級統計系統產生的統計報告分析，追溯 1950 年代前、中期具體實踐中的統計。1951 年，中共國家領導人開始考慮在全國範圍內擴大東北地區的統計體系，隨後六年則見證了中國國家統計局在北京成立，以及全國省、市、縣各級附屬

